

从“青春文学”看大众审美文化流变

李岩

(华侨大学 文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通过梳理“青春文学”发展现状与社会影响,探讨不同时期大众审美与文学建构的复杂景观。具体表现在传统中心的消解,即审美空间由乡村转移至都市,个人意识取代政治集体观,精英文化受到大众文化冲击;消费社会借助审美文化的包装来装点门面,逐步完成对审美文化的挪用与改造,文学创作日渐市场化、符号化;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新时期大众意识中较为突出的精神特征,化轻历史的沉重感,用戏谑的方式消解崇高来对抗消极。

关键词:“青春文学”;审美文化;消费文化;历史虚无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4-0062-04

一、“青春文学”的发展及转型

“青春文学”的定义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从创作群体定义,也有从接受群体及内容等方面定义。本文所探究的“青春文学”则是狭义范畴,即以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为代表创作的有关青春成长的文学作品。关于“青春文学”的起源,学界亦有众多说法。多数学者认为“青春文学”源于五四,该时期的青年为国家和民族未来振臂呼喊,用青春和热血灌注中华民族奔腾流动的血液之脉。他们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以决绝的姿态对抗传统文化,《伤逝》中子君、《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体现的反叛精神可以看作20世纪90年代“青春文学”的精神起源。1979年中国迎来经济改革开放,文学由政治主导转向经济影响。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西方消费文化的盛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涌现大批标榜个性的新青年,展现与五四青年截然不同的亚文化图景。此群体是以郭敬明、韩寒、春树和张悦然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是从1998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佼佼者,其作品多以悲伤、颓废为基调,记录青年成长中迷茫困惑并带有伤痕的过程,直指社会教育等现实问题,表达压抑与反抗的情绪。作品

中的青春书写承载着80后作家的青春记忆,展现他们的情感诉求和鲜明个性。如郭敬明《幻城》《悲伤逆流成河》、韩寒《三重门》、春树《北京娃娃》、张悦然《樱桃之远》等。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带来西方消费至上的理念,大众拥有富足物质的同时也提高了对物质与精神的追求。文化场域在消费理念、商业价值的影响下众声喧哗。“青春文学”异军突起,它们抓住市场机遇,将时尚、潮流等元素与青春融合,形成文化符号,推动青年消费。青春的短暂和珍贵使人们对其十分留恋,情感也是复杂多样的,“青春文学”中大量的情感书写恰恰满足正处于青春期或青春刚逝的群体需求,在这群有经济能力的青年读者推动下,“青春文学”席卷文化市场,令纯文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冬。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青春文学”的喷发期,《光荣日》《悲伤逆流成河》《红孩子》《樱桃之远》等代表作品不断涌现。2010年成为“青春文学”的制高点,郭敬明的《小时代》被《人民文学》收录,《爵迹》在《收获》上刊登,两本杂志一时间销量暴涨,占据同期杂志销量鳌头,郭敬明由此稳居阅读神话的高位。而近年来,文化消费市场逐渐成熟,极强的叛逆性姿态融入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叛逆”与“孤傲”已不再具备煽动效应。“青

收稿日期:2019-12-16

作者简介:李岩(1994—),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春文学”作家也随着年纪增长,阅历丰富,纷纷回归转型,或跨界做导演,或转至网络平台,或向纯文学靠拢。“青春文学”慢慢蜕变为一种类型化写作,主题同样表达孤独、迷茫之感,但叛逆情绪不复存在,励志、正能量成为新一代“青春文学”的精神气息。碎片化信息时代的影响之下,其篇幅短小精悍,形式多为散文式的心灵鸡汤文、日记体或语录体。2012年出版的《因为痛,所以叫青春》,其作者是韩国首尔大学教授,这是一本以导师父亲的身份写给迷茫孩子的疼痛共鸣的治愈作品,该书横扫全亚洲,独占各大排行榜榜首,可见,这是一代青年的共同青春,疼痛、焦虑、迷茫的情感是不分国籍的代际特征。当今,在中国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刘同、张嘉佳、卢思浩等,代表作品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让我留在你身边》《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等。这些作品的主要特点是情感细腻,又温暖治愈,精短的文字篇幅,符合快节奏的社会需求。如果说郭韩时代的“青春文学”是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伤痛日记,那么刘同、张嘉佳时代“青春文学”则是抚慰文艺青年男女的枕边书。

二、从青春文学看大众审美文化流变

80后作家的涌现昭示着“后文学”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创作呈现与传统断裂,与消费文化接轨的现象,具有独特的意义内涵。他们虽处于文学边缘,但在市场上具有极大影响力,令同期主流作家望而兴叹。巨大的成功得益于具有经济能力的80后、90后的追捧与认同,“青春文学”的影响在双向交流中逐渐增强,它一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审美观念的嬗变,另一方面新崛起的大众审美标准推动“青春文学”的不断发展。

1. 中心的消解

(1) 审美空间的转移

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瓦解了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二元对立等级秩序,消解了中心、权威,将受压制的“他者”从原有的秩序格局中解放出来,鼓励多元文化并存。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学也被破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热烈开展、落寞收尾,预示着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学者指出这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边缘化处境的一种抗拒。”^[1]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中心已被大众否定,其中之一的表现便是文学空间

的转移,这背后反映的是大众审美空间的变化。在50-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农村题材”可谓一超独霸。作为文学空间的集中领域,其乡村图景符合人们想象中的空间建构,主流作家更是笔耕不辍,奉乡土文学为圭臬,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等,他们坚持乡土文学的正统地位并不断发掘它的无限价值。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迅速崛起,曾经的文学空间中心地带已由乡村转移到都市,个人化写作取代宏大的史诗性书写。在这股自由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青春文学”混杂在浮躁的都市风中,宛如一缕清香,吹拂到青年读者的心坎里。此时,写作者的审美立场已悄然发生转变,“不再关注宏大崇高的历史命题,不再投身启蒙理想的价值目标,也不再沉迷先锋的文本实验,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的个人意愿和主体意志,在创作中突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迷恋,对自我精神空间的恪守,对欲望本能的演绎,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全面体现作家个人的审美理想和主体意识。”^[2]横观20世纪90年代文坛,大批作家涌入都市,极力构建新时期都市景观,如王朔、池莉、刘震云、陈染等,海外华人作家周励的自传性作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更是掀起奢华都市风的热潮,大众都沉浸在都市消费与娱乐的狂欢中。此时的“青春文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生逢其时,其叙事内容均为都市校园成长的伤痛,呈现驳杂的情感和青春内涵。韩寒中学时期的代表作《三重门》,表现城市校园里少男少女的叛逆与桀骜。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讲述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易遥、齐铭在校园内外纠葛的成长故事。明媚而哀伤不仅是郭敬明小说中的基调,更成为读者心中青春的底色。《小时代》四部曲则描写了林萧、南湘、顾里、唐宛如四个女生在风光时尚的上海生活与学习、工作与成长,她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既有争吵矛盾又相互扶持。青春、金钱与性感交织下的城市娇媚迷人,它诱惑着普罗大众一步一步堕入繁华深渊,这朵在欲望与狂欢的沃土上生长的罂粟之花正发出摄人心魄的迷香,这是“吞噬一切的都市”,在后文学时代,“都市成了新的‘围城’,它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却又吞噬一切,毁灭一切。它的火热和冷漠如当年浮躁的乡土。”^{[3]210}

(2) 意识形态的转变

20世纪50到80年代,文学追求“史诗”的宏

大叙事,“典型化”模式书写,其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文学世界的新中国,是对民族历史本质的追求与肯定。然而文学构建起的中国时代图景在 90 年代的多元化书写中褪色模糊,国家直接的压制管控逐渐消失,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已不再与现实叙事拼接缝合,文学重归“人”的文学。西方多元文化的冲击与文化商业性的诱惑,令第三世界肩负重任的“民族寓言”书写发生转型,文学从政治集体化到个性化,从工具论到本体论,“个体化写作”“身体写作”“日常生活”浮出地表,它们冲破思想禁区,高扬主体性精神,追求自由的书写空间,理想与崇高的价值追求已在众神狂欢中消解殆尽,社会主义主张的集体主义也在个人主义的挤压下荡然无存。大众意识日渐凸显,与人道情怀、政治意识、集体观念渐行渐远,人人迸发出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个体情感及青春萌动。童庆炳在 90 年代便提出,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中国审美文学正走向“意义消解”,创作态度的游戏化,生存状态的物象化,审美对象低层次化等导致“人精神的失落”“诗意的失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消费文化中为牟取资本利润的手段。80 后作家叛逆、桀骜精神气质的养成正是与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社会的迅速转型以及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这一代作家强烈的反叛意识。他们生活条件优渥,享受独生子女的宠爱,批判目之所及所不认同的社会传统伦理及教育制度。“青春文学”避开沉重的历史,将叙事指向带有叛逆印记的青春生活,行文中恣意表达青春的困惑与忧郁,以孤傲、反叛的决绝姿态融入 90 年代多元化的文学格局中。

2. 历史的虚无

(1) 沉重历史的轻化

历史虚无主义是 80 后身上最为突出的精神状态,他们陷入对历史集体失忆的困境,缺乏历史经验的借鉴,又无历史逻辑的支撑,现实的社会生活让他们感到迷茫困惑,甚至失去前进的方向,这些低沉负面的情绪集中在作品中宣泄爆发。同样,在 90 后身上,仍然存在历史虚无的精神表征。

谈及 90 年代的文学作品,风靡市场的“青春文学”与历史隔离,成为抽象的独立存在的符号,在这种文学思潮的波及之下,“被技术装置和抽象符号所支撑着的人,就必然地陷入虚无主义的牢笼。”^[4]曾经熠熠生辉的精神价值在文学作品

中愈发黯淡,直至失去最后一丝光芒,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黑暗与虚无,80 后的气力用尽了,90 后的“丧”延续了 80 后“殇”的虚无感。几年热潮之后,“青春文学”逐渐式微,一部分 80 后作家认识到精神世界虚无的无聊、乏力,他们开始转型,探索新的生命价值。张悦然在发行《誓鸟》时曾说道“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于‘80 后’,我的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人礼。”^[5]她一直在反思 80 后的创作思路,努力将个人融入大历史中,与传统文学对话,为 80 后精神特征寻找依托。张悦然主编的《鲤》杂志,“倡导他们这代人的文学追求,表达出传统文学与当下消费社会可能结合的美学趣味。”^[6]另一部分作家将写作阵地转到网络平台,网络文学由此壮大并形成特有的文化景观:文学创作迎合读者心理需求,以求利益最大化,审美体验由旁观式转为参与式。作者从打赏的金钱数和评论看出读者对作品的反响,并调整作品人物的命运走向,出现读者倒逼文学创作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平台将读者反馈数字化,这些数值背后代表读者的阅读习惯、喜好等,他们利用大数据对数值进行处理,以此来分析读者的行为,进而维护读者的活跃度,2012 年获得巨大成功的《纸牌屋》就是由大数据统计拍成的,从中可看出人的本质力量。

(2) 抽离自我的戏谑

20 世纪 90 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运动已不复存在,人们生活在历史近乎真空的时代,历史参与感降低至零度。“青春文学”只关注个人情感,对历史及政治表现出极大的淡漠,并以戏谑化的方式对抗社会,这反映出人们具有应对消极倾向的虚无特质,他们将自身抽离,完全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待社会与生活。历史总带有崇高感与悲剧色彩,过去的崇高沦为今日戏谑的对象,其间生成的审美流变是在多元文化和多种思潮的纠缠缠绕中展开。“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5]他们犀利讥讽,以“抵抗”的姿态讽刺社会怪状,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调侃生活乱象。韩寒的《一座城池》,用批判的笔调反讽都市这座“围墙”,阴谋、欺骗、黑暗无处不在,几个青少年从一座城逃到另一座城,却始终逃离不

掉阴暗的“围墙”。唯金钱论的社会中,其他都是虚的,大众在虚无中感受虚无,调侃虚无,感受更虚无的落寞,他们试图否定、解构真实的价值存在。这种戏谑化行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象化表现,其背后掩映着大众深深的无力感和价值虚无危机,这是一种不敢正视人与现实的恐惧感。飞速发展的社会里,青年所承受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物质带来的压力:个人价值观念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理想世界与现实物质社会的冲突等,迫使他们做出反抗的表征行为,即以“丧”为主要情绪的非主流文化的盛行。《人民日报》对“丧”描述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的话,他们丧失心智,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只是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6]“丧”可以理解为现代大多年轻人的精神危机。青年的“丧”文化是对焦虑、迷茫的未来采取的防御性措施,通过“反讽”等手法消解现实压力,宣泄负面情绪。然而这种脱离了鲜明价值取向的文学,是无根的,

无审美特质的,这也是90年代“青春文学”逐渐式微,在21世纪新时期以另一番样貌重新示人的内在原因。萨特曾说存在先于本质,生命本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在宇宙无限长河中,人类书写的历史早就出现无数次生死轮回,朝代更迭,不断重复着。人类的生命虽然重复,但心灵充实便有意义,生命虽然虚无,但为我们带来无限规划的可能性。

三、结束语

大众审美文化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市场经济环境,文学的转型亦受人们审美观念所驱。“青春文学”是折射大众审美文化历史演变的极佳参照物。当今社会正处于审美文化的转型期,“青春文学”从无到有,由盛转衰,为把握大众审美流变提供了一个合理切入点,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审美文化的缺失,为探讨审美文化走向提供特定的文本脉络。

参考文献:

- [1] 陶东风. 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6.
- [2] 洪治纲. 1992—2009 多元文学的律动[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110.
- [3] 郜元宝. 小说说小[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 [4] 冯黎明. 文本的边界——徘徊于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的“文学性”概念[J]. 文学评论,2006(4):28-34.
- [5] 徐妍. “80后”:一个被制作的商业神话的终结[J]. 布老虎青春文学,2007(1):152-154.
- [6] 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 第2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91.

The Change of Mass Aesthetic Culture from 'Youth Literature'

LI Ya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literature" and social influence, to explore complex landscape of the mass aesthetic and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from which the rheological analysis mass aesthetic concept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of aesthetic view, embodied in the center of the traditional digestion, namely the aesthetic space shifting from rural to urban,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to replace political collective view,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shock; With the help of the packaging of aesthetic culture, the consumer society gradually completes the appropr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culture, and literary creation is increasingly market-oriented and symbolized.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become a prominent spiritual feature in the public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which lightened the heavy sense of history and dispelled the sublime in a playful way to combat the negative.

Keywords: youth literature; aesthetic culture; consumer culture; historical nihilism

(责任编辑:李 军)